

一日整理斋中旧书，烟土披露，纯忽焉临止：自顾平生有两大病：一曰好古成癖，二曰不务正业，有此二病，昔日曾寓目不少杂学旁修之书，间或亦有小小故事。作为积年书虫，何不将其书其事与读者分享？

江晓原◎著

脉望夜谭

巴蜀书社 出版社

脉望夜谭

江晓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脉望夜谭/江晓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309-09092-5

I. 脉… II. 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2394 号

脉望夜谭

江晓原 著

责任编辑/姜 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 字数 91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978-7-309-09092-5/I · 698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絮语

承《博览群书》杂志热诚邀请，兹开专栏，奈灵感缺乏，搜索枯肠，久未应命。一日整理箱中旧书，烟土披离，纯忽焉临止：自顾平生有两毛病：一曰好古成癖，二曰不务正业，有此二病，昔日曾寓目不少杂学旁鹜之书，间或亦有小小故事。作为积年书虫，何不将其书其事与读者分享？品高兄力怂恿之，遂有“脉望夜谭”之设，隔月刊登。所涉之书，中外皆有，俾合“博览群书”之旨。

不意此专栏中小文，谬蒙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青眼，命集结成书，此属雅事，欣然应之。遂又增入同类之文数篇，所谈之书，并附书影，方便读者览其文而见其书。或有同好，则幸甚矣。

江晓原

2012年6月2日

于上海二化斋

目 录

作者絮语	1
少年惊艳《梅花谱》	1
当了巴比伦王室的见习巫覡	
——关于《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	6
在灯红酒绿杀人夜想到《金枝》	12
朝鲜半岛之当年明月	
——在汉城搜寻《三国遗事》	18
“难道真有人将它编出来了？”	
——《柏林色情艺术博物馆藏品集》	24
沉溺在白日梦中的小文人	
——《读书堂西征随笔》	31
《名教罪人》：雍正发动中国第一场大批判	39
《性史 1926》：八十年后重新审视	46
“花前白发风怀尽，不是销魂是断魂”	
——关于《海藏楼诗集》	52
1645 年的《西洋新法历书》	60



谁能只手评优劣,李杜曾经不入流	
——《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业余统计学	66
那部传说中的千年秘籍《医心方》	73
近四千年前的《汉穆拉比法典》	80
《嚎叫》:叛逆也修成了正果	87
“卿为阿依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	
——从黄克孙译《鲁拜集》谈起	93
多妻的小说世界:关于《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101
羊皮书上的一场科学史奇案	
——从《阿基米德羊皮书》看科学、技术、文物和投资	110
一部奇书和一场虚惊	
——《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	117
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	
——读《乳房的历史》	123
吴歌小史话当年	128
世纪末的《西方正典》	136
多情才子竟西行:戈革其人其书	141
“金学名票”之《挑灯看剑话金庸》	149

少年惊艳《梅花谱》

我以前写过一篇题为《迷恋〈西厢记〉，冷落天文学》的文章，其实在《西厢记》之前，曾经有另一册古书让我大为痴迷，而且其程度远远超出《西厢记》，那就是《梅花谱》——不要误会，这《梅花谱》既不是养花种花的手册，也不是青楼名妓的花榜，而是一种清代的象棋谱。

我在“文革”后期的 1972 年进入上海一家纺织厂当电工，那时还是个不太懂事的 17 岁少年。我所在的这家工厂棋风甚炽，在当时的上海纺织行业小有名气。那几年，象棋成了我青春骚动期的梦中情人。我对象棋的痴迷程度，只要提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我家老式缝纫机上总是放着棋盘，盘中总是有正在拆解的棋局，我甚至在午夜梦回想起一着，就会起身到棋盘上去摆放参详。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梅花谱》。一种“惊艳”的感觉，让我一下就为之倾倒。

在中国象棋的布局发展史上，《梅花谱》被认为是一

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此之前，以晚明棋谱《橘中秘》为代表的早期布局理论，一直认为在开局中，只能用当头炮对抗当头炮（顺炮或列炮），后手起马是无法抗衡当头炮的。而《梅花谱》一出，以八局精妙无比的“后手屏风马破当头炮”，宣告了“屏风马足以对抗当头炮”的布局新时代——直到今天，这一结论仍然是主流象棋布局理论所赞同的。

关于《梅花谱》的作者，我们所知甚少，只有书前的序中有如下一段信息：

安蹇先生姓王名再樾，字正己，康熙时人，家贫，性刚直，力学不求闻达，而世亦无知之者。抑郁无聊，为象戏以消岁月。得意疾书，爰成六则，遂名之曰《梅花谱》。其间纵横驰骤，不可端倪，真有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之妙，诚象戏之钜观也。

看来这是一位寂寞高手。当然，那时象棋也还不是真正能够登大雅之堂的游戏（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人认为中国象棋的地位在国际象棋和围棋之下），所以那时的象棋高手也许很难不寂寞。

《梅花谱》八局“后手屏风马破当头炮”被认为是全谱最精华的部分。上来第一局“破巡河车吃卒用炮打象”就先声夺人，以大开大阖的阵势诱敌深入，弃子夺势，随后自己也单骑突进，直捣黄龙，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精妙杀

着，令先行的当头炮方防御全线崩溃，最终被逼入绝境。此后七局，局局都有突破和创新，谓之“有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之妙”，信非虚语。由此一举奠定屏风马布局体系的地位。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象棋的布局理论早已告别了初级阶段，杨官璘的三集《中国象棋谱》在 1957～1962 年间出版，代表了那个时代布局理论的高度（我当时读的是 1974 年第四次印刷的版本）。但是告别了初级阶段的布局理论，对于非专业棋手来说有一个很没劲的特点，那就是太平淡。因为现代布局理论中，双方都走“官着”，即不犯错误的着法，于是四平八稳，最终走向“官和”——大家都不犯错误的着法，当然只能导向和棋。

可是在《橘中秘》和《梅花谱》之类的古谱中，那些精妙的杀法之所以能够上演，恰恰是因为有一方犯了错误——尽管这种错误通常不容易被意识到，或者是业余棋手容易犯的。古谱中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这种“有人犯错误”的棋谱，对于业余棋手来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因为那些精妙绝伦的杀法会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而那些导致精妙杀法能够上演的错误，也会因此被深深记入读者的脑海。

《梅花谱》被视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并不是仅仅依靠八局“后手屏风马破当头炮”。在传统的斗炮局中，《梅花谱》也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它将《橘中秘》所代表的早期斗炮布局也推到了全新高度。它的“顺炮直车破横车”五局、“顺炮横车破直车”五局和“列手炮”五局，着法雄浑有

力,同时却处处充满机巧,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我自己当年的象棋水平,在我工作的纺织厂,排不进前五位(当年全国冠军胡荣华来我厂表演赛——他一人以盲棋同时对抗我厂五人五局明棋——我就未能入选),但也许是因为我们厂棋风甚炽,我1978年春进入南京大学后,居然四年都忝列校学生象棋队的成员。虽然我在校队排名最后(第七名),但在四年间对校外比赛竟保持了不败纪录。记得有一次比赛中,《梅花谱》就大放光彩。

那次是我们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队比赛,我抽签抽到的对手,据说是那年他们的全校亚军。比赛开始后,走到第八回合,对方陷入长考,我就去洗手间了。我的一个队友悄悄跟进来,低声对我说:你怎么能那样下?太危险了!我对他说:你看着,我回去他就会投降。队友将信将疑。我回到棋局,对方继续思考了几分钟后,果然投子认输!这时相邻各台都还刚刚开局,我这台居然八个回合就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奏凯收兵。

原来这一局我就是采用了《梅花谱》“顺炮直车破横车”第一局一个变例中的着法,让对方落入了陷阱。虽然他右炮沉底并吃去我未动的左马,对我左路形成凌厉攻势,然而我的双炮和右车引而不发,已经对他构成绝杀。当他开始长考时,已经意识到情形不妙,但长考的结果使他看到无论怎样挽救都已经无济于事,所以决定不再死拼下去,而是早早投子认输,接受一个体面的失败。

但自从念研究生以后，我对象棋的兴趣烟消云散，棋艺自然也早已不复当年。如今我电脑中有电子版《梅花谱》以及许多其他象棋古谱，偶尔在电脑上打打谱，或参详一番高手对局，那也只是一种怀旧情结了。



《梅花谱》有中华书局 1926 年排印本，校阅者居然是吕思勉。10 年后的第六次印刷，当时定价“国币”三角，如今网上旧书索价数百元人民币。

当了巴比伦王室的见习巫覡

——关于《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北京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常有机会随侍先师席泽宗院士。先师讲学余暇,也不时回忆学界前辈种种轶闻趣事,每每令我听之入迷,或大开眼界,或心向往之。一日先师闲谈时曰:某院士曾向我亲言:“自己一生学问,就从几册书中来。”初闻此语,颇觉夸张,因与我一向服膺的“博览群书”之旨明显不合。先师曰:这样的书,当然是指那种能够为一门学问打下扎实基础的传世之作,非等闲之书可比。我率尔叩问道:那我们天文学史领域中,有何书可以当此?先师略沉吟了一下,曰:诺格堡之《古代西方数理天文学史》,差可当之。

我那时初入学问之途,向学之心甚切,第二天就从研究所的图书馆——该馆至今仍是全中国最完备、最好的科学史专业图书馆——书库中将诺格堡(O. Neugebauer)的《古代西方数理天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借出, 凡三巨册(两册正文一册附图)。当时也不管是不是力所能及, 就摆开阵仗“攻读”起来。

诺氏书中的第二卷, 专讲巴比伦天文学, 其中经常引用到一种缩写为 *ACT* 的文献, 因为老是遇到这个缩写, 我就注意起来, 一查, 原来这书就是《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正是诺氏本人编的, 1955 年在伦敦出版。

那时老师们经常强调“第一手文献”的重要性, 而以往中国学者之所以很少研究涉及西方天文学史的课题,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国内难以接近西方的第一手文献。现在这个 *ACT* 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手文献了, 我怀着碰碰运气的心态, 又到研究所图书馆的书库中去找, 居然找到了! 又是三巨册, 布面精装。从那张早已发黄的空白登记卡上, 我知道该图书馆 1956 年购入此书, 30 年来, 我是此书的第一个读者。

巴比伦故地在西亚两河流域(今伊拉克), 古称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的文明可以上溯到约公元前 4000 年时的苏美尔人(Sumerians), 以后阿卡德人(Akkadian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统治。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于公元前 330 年征服该地区,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 他的部将们瓜分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大帝国, 两河流域开始了塞琉古(Seleucid)王朝时期。



ACT 中的一页，一块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的摹本。

O. Neugebauer,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 (ACT)*,
Lund Humphries, 1955.

虽然迦勒底人的星占学和天文学在欧洲早已非常有名,但只是近百年来来的考古研究才揭示出: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已发现的天文学原始文献,绝大部分属于塞琉古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末。在西方科学史上,这属于非常重要的“希腊化时期”。

这批已发现的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文献,主要是 300 张天文表。有三位耶稣会神甫, J. N. Strassmaier、J. Epping 和 F. X. Kugler,曾对此作了极为艰巨的整理工作,包括释读这些表格的内容、根据表格本身的数理结构将缺损部分补全等等。诺格堡又在此三位神甫工作的基

基础上作了综合性研究，编成三巨册《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前两册是对这些巴比伦天文表中天文学内容和数学方法的分析，第三册包括这些楔形文书泥版的照片、摹本和翻译成阿拉伯数字的原始表格。诺格堡在卷首将此书题赠给上述三位神甫，尊他们为研究巴比伦天文学的先驱。

尽管诺氏表示：由于巴比伦天文学发展过程的资料还很缺乏，“我们尚远远谈不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历史”，但考虑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这批资料已经具有相当大的“集大成”性质。况且已经有人前赴后继作了如此艰巨的研究整理工作，将表格从恍如天书的巴比伦楔形文书变成了阿拉伯数字，那是何等难得！考虑到这些因素，我立刻将这三巨册借回宿舍，当成我的“枕中鸿秘”之一。

除了古希腊之外，世界诸古代文明中，都没有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活动，存在的只是星占学活动——本质上可以归入巫术范畴。但是在星占这种巫术活动中，却不得不使用某些天文学方法。《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中所记载的，就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的星占活动中所使用的天文学方法和数据。

古代天文学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件事：在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在古代东西方都是如此。现代天体力学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可以准确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而在天体力学问世之前，古人要解决上述

问题,基本上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采用几何模型(古希腊天文学就是如此,受其影响的阿拉伯天文学和印度天文学也是如此),二是采用数值模型。

《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就是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周期数值模型:通过长期观测,积累了非常准确的数据,由此构建一系列周期函数,利用这些周期函数的叠加,也可以相当精确地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

不过,真要将书中这些神秘表格读懂,那可是一桩苦差。主要是它们实在太枯燥了。在我将博士课程全部修完,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与巴比伦及这些楔形文书天文表完全没有关系——之后,我有时就可以回上海了。有几个月时间,我在上海临时借的一间古人所谓“几榻萧然”的破屋中,发奋攻读诺氏的这两部大书。《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既难懂,又非当务之急,当时究竟是什么念头驱使我在“两线作战”的状态下(那时的当务之急是准备博士论文)去攻读它们的,现在几乎已经记不起了。也许就是纯粹的好奇心吧。

钻研这些天文表时有一种相当奇特的感受。我在那间破屋中经常想,两千多年前的那些巴比伦星占学家——也就是巫覡(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女巫曰巫,男巫曰覡)——也同样要钻研这些表的啊,我现在就权当是在担任巴比伦王室的见习巫覡,进行专业培训吧。两千多年前的人都能看懂的事情,我只要肯下工夫,总该也能看懂吧。

这几个月的“见习巫覡”，最终并没有白当。我将《巴比伦泥版楔形文书天文表》中对太阳和行星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与中国六朝隋唐时代历法中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了一些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的新线索。随后的两年中，我在《天文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讨论巴比伦天文学方法与古代中国历法之间关系的系列论文。这可以算是这场好奇心带来的意外成果。